

文史大觀

一九九六年第一期



中央三次庐山会议和
毛泽东《登庐山》诗
邓小平受命赴庐山
千古庐山千古诗
佛光道影溢匡庐
「世界村」里别墅群



顾问: 吴永乐 戴执中
 江国镇 厉志成
 总编辑: 周奎书
 副总编辑: 甘炳文 罗炎卿
 陈文华 聂国柱
 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安群 朱宗奎
 杜伊力 李国强
 李天侨 杜德凤
 吴吉如 吴志清
 俞向党 俞兆鹏
 袁 牧 夏逢南
 彭适凡 熊桂花
 执行编委: 周奎书 李天侨
 熊桂花
 编辑部主任: 万德恺
 副主任: 曾 粮 喻民昆
 刊名题字: 康 庄
 责任编辑: 易芳霖
 美术编辑: 李庆明
 编 务: 涂苏中 雷心刚
 张克勇 胡群红
 黄 茜 蒋文澜

协理与协办单位

(按协理姓氏笔划为序)

万里扬 江西桑海企业集团
 王贤才 江西省文史研究馆
 王 翔 九江民生实业有限公司
 李天侨 江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余修炎 江西共青垦殖场
 张先仁 江西赣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
 胡飭海 赣新电视有限公司
 熊桂花 江西京西工贸公司
 欧阳效芳 江西赣南金达有色金属矿产品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 江西省政协学习文史
 委员会

编辑出版: 《文史大观》编辑部

地 址: 南昌市叠山路 289 号

电 话: 6801814 68038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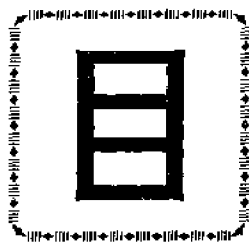
邮 编: 330008

照排印刷: 中共南昌市委印刷厂

江西省报刊准印证: 刊字第 01——059 号

定价: ¥3.60 元

2057/47



1996 年第 1 期(总第六期)

(庐山申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专辑)

伟人足迹

- 4 中央三次庐山会议和毛泽东《登庐山》诗 周奎书
- 6 邓小平受命赴庐山 尹超海

文化遗产

- 8 庐山,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丰碑的体现 徐效钢
- 10 千古庐山千古诗 汪国权
- 13 佛光道影溢匡庐 张国宏
- 16 道教宗师陆修静 风 衔
- 18 慧远——佛教中国化的先行者 卢 晓
- 22 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徐顺明
- 23 朱熹振兴白鹿洞书院 李科友
- 24 铁壁染翠 苍崖铸金
- 漫话庐山石刻 邹秀火 陈岌
- 27 “世界村”里的别墅群 欧阳怀龙

匡庐奇秀

31	庐山珍贵的自然遗产	
	——第四纪冰川遗迹	马长信
33	庐山，地球的自然纪念物	熊 炜
35	千奇百态亦朦胧	
	——庐山云雾	李延国
38	天下第一谷帘泉	匡 草
39	含鄱口和三叠泉	任祥兴
41	石门涧今昔	张 雷
42	景观五则	
	——御碑亭、锦绣谷、仙人洞、文殊台、三宝树	熊大廷

近代风云

45	庐山谈话会始末	熊 炜
48	庐山，国共两党风云际会的大舞台	李延国
52	北伐战争中两次在庐山讨论的“迁都”之争	戴 建

现代史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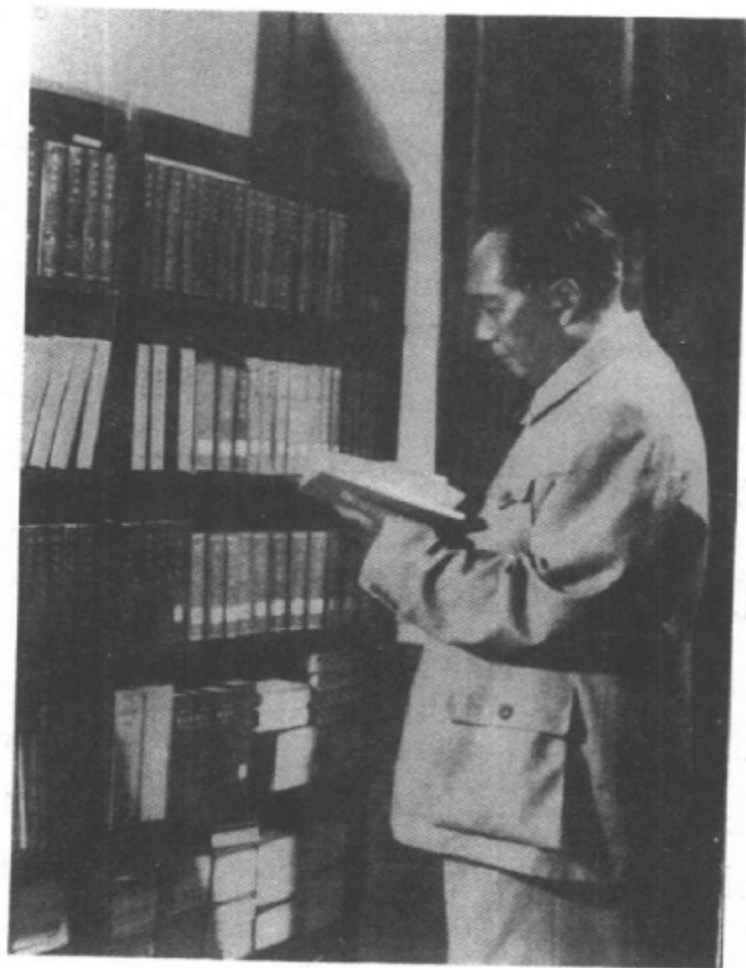
54	朱德委员长视察庐山药材场	贺 伟
55	刘伯承元帅在庐山的日子里	殷荫元
57	庐山植物园六十年	汪国权

文史随笔

59	庐山观月处	陈世旭
61	庐山山水诗欣赏点滴	胡宗刚

物华天宝

62	庐山云雾茶	匡 草
63	庐山被子植物的区系成份	杨建国 陈世隆



毛主席在庐山

中央三次庐山会议和 毛泽东《登庐山》诗

●周銮书

庐山，是个集会的胜地。每逢暑期，江西、湖北、安徽、江苏以及中央一些部门，利用庐山的许多优越条件，来这里召集各种重要会议和专门会议。在1959年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也曾在庐山召集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央全会。这样，庐山就不仅是人民大众休息、游览、避暑和疗养胜地，而且也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政治活动场所。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庐山更能

做出它的特殊贡献。

在中央召集的这几次重要会议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云集庐山。他们居住的地方，如毛泽东居住过的河东路180号、175号别墅，周恩来居住过的河西路422号别墅，刘少奇居住过的柏树路124号别墅，朱德居住过的中八路759号别墅，邓小平居住过的河西路476号别墅以及彭德怀居住过的河东路176号别墅，现都已成为国内外游人怀

念、瞻仰、凭吊的去处。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居住过的四座别墅和位于火莲院的庐山大厦，即将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党中央在庐山召集的会议，主要有1959年的八届八中全会，1961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70年的九届二中全会。

中央第一次庐山会议，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之间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和8月2日至16日之间举行的八届八中全会。这次会议原拟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的偏差，但因错批了彭德怀，将纠“左”变成了批右，使原来设想在庐山开一次神仙会的计划落空，突然间开成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会。这次会议很不成功。在庐山批了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四人，在全国被批判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竟达三百几十万人，这是史料所不及的。

中央第二次庐山会议，是在1961年9月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富有成效。在周恩来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导下，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中的失误，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工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等文件，引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健康、正确的轨道。

中央第三次庐山会议，是在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这是为召开全国四届人大作准备的一次会议。会议一开始，林彪争先讲话，以要设国家主席、必须由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为幌子，急于抢班夺权。林彪的谋士陈伯达在会上散发《天才论》

的语录，竭力恭维毛泽东，蒙混视听，以求林彪的图谋得逞。他们“钟馗打鬼”式的手法被毛泽东识破。毛泽东以批陈伯达为突破口，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猖狂进攻，挫败了他们所策划的反革命阴谋。在满天乌云被驱散以后，为四届人大作准备的各项议程，才得以正常的讨论和通过。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曾写《牯岭即事》一诗，记述此事：

山中连日雨阴沉，秋肃为功动鬼神。
午后云开红日出，林间暖入晚新晴。①

毛泽东三次上庐山主持党中央召集的会议。庐山的许多地方，留下了他的足迹。他在芦林湖畅游、在含鄱口眺望的照片为人们所喜爱和珍藏。他第一次上庐山，是在1959年6月30日。庐山巍然屹立的气魄，襟江带湖、联结吴楚的形势，盘旋的道路，茂密的森林，变幻的云雾，飞洒的流泉，以及庐山历史上许多动人的传说故事，都给他以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遐思。第二天，7月1日，他挥毫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

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1993年，庐山管理局党委在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在芦林湖的北端，建筑毛泽东诗碑园，将这首诗矗于园中最显著的位置，以示纪念。

这首七律，气势磅礴，感情奔放，词锋锐利，浮想联翩。诗人赞颂了亿万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热情，诗中联想到过去陶潜所十分向往的桃花源，在陶潜所处的时代，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那样尖锐复杂，要实现“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社会，是完全不可能的，只能是一种幻想。陶潜已经去世一千多年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消灭了剥削压迫的新中国，才是劳动人民能够真正自由的耕田种地的现实的桃花源。诗人巧妙地运用桃花源的掌故，集中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也概括地总结了庐山这个世外桃源两千多年发展的历史。

注①《董必武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51页。

（作者系省政协常委、学习文史委主任、本刊总编辑）



邓小平在庐山

邓小平受命赴

庐山

●尹超海

峻伟诡奇、峰峦迤丽的庐山，不仅是驰名中外的旅游、疗养、避暑的胜地，也是新中国领导人活动的政治舞台。

1961年的金秋，正当中国经济形势严峻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来到庐山，留下了闪光足迹……

上庐山 临危受命 为补台 顾全大局

三年自然灾害和“反右倾”所带来的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使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深为忧虑，决定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前，毛泽东、周恩来在北京曾“三顾茅庐”，把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这位智多星请上庐山。

8月底的一天，两辆伏尔加牌轿车徐徐驶进267号别墅的庭院。车门打开，邓小平和夫人兼他的机要秘书卓琳，女儿邓楠分别从小轿车里走了出来。早已等候在这里的庐山管理局局长楼绍明上前紧握着邓小平的手

说：“首长一路风尘仆仆，辛苦了。”邓小平同志连忙说：“哪里，哪里，我们给同志们添麻烦了。”

紧接着楼绍明向邓小平、卓琳介绍四周的环境。当介绍到对面是牯牛岭，南边是掷笔峰，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址就在那里时，卓琳感到习习的凉风吹来，蓦然脸上失去了刚才的笑容，她仿佛感到两年前庐山会议“反右倾”的云雾还有点在空中飘荡。那次庐山会议，小平同志留在北京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没有卷入那场历史性的悲剧。

服务员以为卓琳同志累了，招呼说：“首长路上辛苦了，进屋先洗洗吧。”

傍晚会议秘书处送来了中央工作会议日程表和有关文件。卓琳收好文件后，在邓小平旁边沙发上坐下来，若有所思地问：“老邓，我有些心里话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讲？”

邓小平已感到卓琳想要说的是什么，“你不问，我也知道你要对我讲什么。你心有余悸，怕我邓老总也走彭老总的老路，是不是？”

卓琳关切地说：“前车可鉴。五九年庐山会议，张闻天没有听夫人刘英的劝告，他这个搞外交工作的却在会上大谈经济工作，讲了真话。结果挨了批。彭老总等人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次，你讲话也不要太直率了。别也戴一个帽子回北京。”

邓小平不以为然地笑了一下说：“共产党人就是要讲真话，我该说的还要说。大跃进过了头，违反了客观规律嘛。”

卓琳心里怔了一下，扶正一下眼镜：“情况虽然完全是这样的，但你在会上可不要说得这样重啊。”

“正因为现在问题严重，说重一些，好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不过，我是真诚地为毛主席补台，而不是拆台。”

搞经济 重视工业 要人才 教育为本

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中共中央庐山工作会议在庐山人民剧院二楼大厅举行。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前排就座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主席坐在中间的高靠背藤椅上，左边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右边是陈云，邓小平，后面的几排分别坐着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

会议讨论了工业、粮食、财贸和教育问题，重点讨论研究了工业问题。9月5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他既实事求是摆问题，又高瞻远瞩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讨论，9月15日，会议通过了由邓小平主持修订的《高教六十条》、《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9月16日，会议又通过了邓小平主持修订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这三个重要纲领性文件，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初步走上了规范化、条理化道路，对于当时战胜自然灾害，扭转严重的经济形势和指导工业，以及高教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同志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有营养 素菜淡饭 系百姓 以粮为先

会议期间的一天，快到吃晚饭的时间，邓小平开会还未回来，生活管理员杨基友趁这个时候征求卓琳的意见，打听邓小平同志喜欢吃什么菜。卓琳报了豆角、茄子、茄子、青菜、辣椒和少量的瘦肉。

“卓大姐，首长工作很忙，你报的多数是素菜，营养跟不上，我当生活管理员的可负不起这个责任。”杨基友有点不高兴地说。

卓琳笑着耐心解释说：“你们爱护首长的心意我很理解，我比你们更了解首长，这些菜都是首长最喜欢吃的菜，而且是很有营养的菜。”

伏尔加轿车在朦胧的月色下驶进庭院，已是夜晚八点钟，邓小平从会场回来。邓楠为父母盛好饭。邓小平端起碗就吃，打趣地说：“会开晚了，肚子里闹革命了，这饭菜吃起来好香啊。”

卓琳给小平碗里夹菜，微嗔地说：“你说好香，刚才管理员和厨师还向我提意见，说素菜多了，营养跟不上，弄坏了首长的身体，他们负不起责任。”

邓小平说：“群众真好啊，他们吃不饱肚子，还惦记我们。”

“是啊，自古民以食为天，你要多为党和毛主席分忧，为六亿人民把粮食解决好。”卓琳意味深长地说。

邓小平说：“在北京时，毛主席和周总理、陈云同志和我谈到粮食问题，明确肯定了陈云同志提出的先安排好市场的意见，要把衣食住行安排好，这是关系到六亿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大问题。吃完饭，我就起草一个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提纲。”

邓小平同志伏案灯下，草拟发言提纲，提出了“粮食指标只能退到长江，不能退过黄河”，并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具体措施。

（作者系庐山管理局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庐山，

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丰碑的体现

●徐效钢

二千多年前，当司马迁南登庐山，将庐山载入史学巨著《史记》中时，这座独峙于鄱阳湖之滨的名山，便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辉煌历史。这种历史根植于庐山绝美的自然环境，借助于众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的参与，显示出中国文化历程的许多鲜明特征，是中国，也是世界的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庐山的超拔与沉静，为东晋时期的士人对自然山水“畅神”、“悟道”特质的全新观照，提供了一方出神入化的绝妙境地，也赋予了他们不朽的创作灵感。陶渊明在庐山开创的田园诗体，为中国古典诗歌开辟了崭新的境界。他那种可与庐山同在的峻洁人格、不屈品质，以及平淡自然的风格，影响了他以后的整个中国诗坛。谢灵运等人在庐山的杰出创作，特别是他们在创作中所确定和体现的全新文化意趣，使庐山成为中国山水诗的策源地。顾恺之、荆浩以庐山为题材的绘画，玄远幽深，意遥迹高。还有多年生活在庐山的宗炳阐发的山水美学理论（如“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等议论），使庐山成为中国山水画的发祥地，魏晋士人苦苦追求的自给自足以及逍遥之趣、无言之美、素朴之秘，在庐山得到了最高境界的体悟。他们在庐山徜徉山水、任情适性，高扬自然之美，使天然而无雕饰的自然美从此成为民族性的审美崇尚，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唐宋之时，与中国文学的巅峰状态相呼

应，庐山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极品现象。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至今家喻户晓；苏轼的《题西林壁》以其丰富的哲理、充满辩证的神韵，奠定了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的范例性地位。“不识庐山真面目”已成为中国人使用频率极高的习用成语。写本《庐山远公话》在敦煌石窟被发现，再现了唐代变文这一失传已久的独特文学式样。

庐山又是中国古代佛、道两教开创宗教思想弘传宗教教义的圣地。慧远在东林寺创立的称名念佛的净土宗，为饱受危难的中下层人士辟出了精神解脱的新天地，简单易行的修行方法极大地推进了佛教在中国的大流行。道士陆修静在庐山简寂观开创了中国道教的灵宝派。他以庐山的修行实践为依托，首次使用“道教”一词，促使南方各派汇归一派，并奠定了《道藏》的基础，确立了道教的斋戒仪范。禅宗第八代祖师马祖道一在庐山活动多年，其开创的临济宗、沩仰宗，多有庐山之功。近代以后，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教派，也在庐山修建寺堂，布道传教，广延信徒，中国本土文化在庐山也开始接受了西方异质文化的激烈碰撞，至此庐山呈现出一种各教并处一山的罕见景象。

谈到教育，古代庐山更有着里程碑式的辉煌成就。散漫于山间的佛寺道观、书院讲堂，实际上也有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与教化的功能。特别是儒家的文化教育，在庐山得到了

史书公认的弘扬和传播,始建于南唐的白鹿洞书院,则一直有着天下书院之首的盛誉。在书院教育蓬勃兴盛的宋代,庐山更是学者们聚众讲学,构建道德人格的理想场所。在朱熹的兴复之下,白鹿洞书院明定学规、研讨学术、推行道德教育,孕育和产生了理学的重要思想和重要著作(如《朱子语类》等)其教育理论、讲习模式、理学思想影响后世达七百年之久。

庐山所产生的并有着广大影响的科技文化,为庐山文化的建树,增添了份额极重的科技含金量,这在中国名山中绝无仅有。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庐山西林寺的密檐砖塔、观音桥、紫阳堤、太平宫的旋玑玉衡等都有重要地位。庐山温泉是中国最早的医疗温泉之一。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了大量庐山药物。创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李四光庐山第四纪冰川学说,为中国乃至世界第四纪地质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1996年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已将庐山第四纪冰川列入大会地质考察项目。庐山作为中国著名的植物种质资源库早已享誉世界,首次在庐山发现或以庐山命名的植物迄今已达40种。而第一个供科学研究的庐山植物园,也一直是中国国家植物研究的重要基地。另外,庐山的野生动物资源也异常丰富,仅首次在庐山发现或以庐山命名的昆虫就有33种。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庐山也有自身的突出贡献和显著标志。东晋时期,慧远邀请尼泊尔、印度等国禅师来庐山翻译佛经,并亲自为之撰写序跋论赞,使之广为传播。同时慧远

的净土学说也流传到国外,至今日本的净土宗仍视庐山的东林寺为祖庭。明代以后,西学输入,耶稣教士利玛窦来到白鹿洞书院讲学,介绍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使书院师生们耳目一新。19世纪后期开始,大批中外各界知名人士在庐山建筑了大量别墅,至今保留完好的有十一个国家的各式风格

的别墅600余栋,使西方别墅有机地融汇在中国传统的园林景观之中,形成了一种中国名山中独特的别墅文化。

庐山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最突出的方面是它在此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和演变,体现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如上所述,东林寺代表了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书院代表了中国宋代以后七百年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向,牯岭代表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潮流。历史上,朱元璋曾视庐山为明王朝的开国奠基地,封庐山为“庐岳”,使庐山位

尊天下。本世纪三十年代,蒋介石政府又将庐山作为夏都。1937年,中国共产党在庐山促成了国共合作抗日,开辟了反法西斯主战场之一的中国战场,为人类正义和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庐山主持三次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大影响的中共中央会议。

中国文化的伟大历程,在庐山有着多方面、多角度的反映和折射。庐山与中国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思想、信仰、事件、人物密切相关,这一切,使庐山文化具有常盛不衰的永久魅力。(作者系庐山图书馆馆长、副研究员)



体现中国古代建桥技术的观音桥

千古庐山

千古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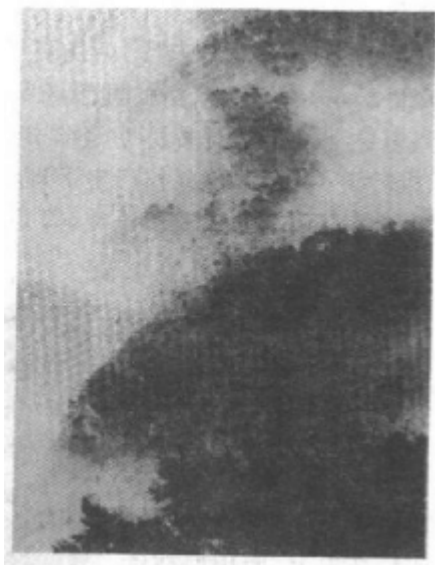
●汪国权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这是唐代诗人李白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写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一诗中的四句。毛泽东1961年9月16日书写，“以赠庐山党委诸同志”；同年，毛泽东没有用更多语言去安慰失去丈夫而陷入悲痛之中的儿媳——刘松林，又书写了这四句诗相送。著作者与书写者，相隔1200年，是什么使他们在这四句诗上相通呢？李白这四句诗，描写了庐山的壮美与长江的雄伟，胸襟开阔，气魄豪迈。毛泽东“跃上葱茏四百旋”，登庐山，观长江，冷眼向洋，是否有此同感？

庐山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与大江（长江）、大湖（鄱阳湖）三者浑然一体，雄、奇、险、秀，刚柔相济的壮丽景色，体现了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是大自然奉献给人类的珍贵遗产。

秦皇、汉武等帝王直到方士、高僧、诗人、书家、教育家、科学家，甚至政治家，对庐山莫不趋之若鹜。在与庐山自然的亲和中，他们的精神得到了升华。这种升华既是一种心灵的汲取与补偿，也是一种精神的输出与赋予。他们智慧的火花，照亮了这座矗立在大江、大湖旁宁静幽美山林漫长的岁月，赋予她丰厚的文化内涵。

“崇岩吐气清，幽岫栖神迹。希声奏群籁，响出山溜滴。有客独冥游，迢然忘所



黄云万里动风色

适。挥手抚云门，灵关安足辟。流心叩玄扃，感至理弗隔。孰是腾九霄，不奋冲天翮。妙是趣自均，一悟超三益。”

晋代东林寺高僧、“莲宗”创始人慧远这首《游庐山》，为“庐山题咏之始”。自此以后，仰慕庐山以及登临者日众；流连挥毫，歌咏之富，为各名山之首。

开创我国田园诗风、不“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的陶渊明，四十二岁挂印辞官，“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归隐庐山，茅舍菊篱，饮酒赋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陶渊明种田自给，“唾弃富贵”之情跃然纸上。

好山泽之游的谢灵运，来到庐山，登上“绝顶”，放眼四望，庐山壮丽的景色使他感奋不已，他写道：

“山行非有期，弥远不能辍。但欲掩昏旦，遂复经圆缺。积峡忽复启，平途俄已绝。峦垓有合沓，往来无踪辙。昼夜蔽日月，冬夏共霏雪。”

慧远、陶渊明和谢灵运三人，热情讴歌

庐山的自然美，是他们诗歌的特色。他们在创作庐山诗歌活动中，对中国山水诗的发展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也为庐山文化的建立，树立了丰碑。

放逸超脱、纵情山水的李白，庐山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在这位诗仙的笔下，凝结着对自然山水至美的追求。李白笔下与庐山有关的诗虽然只有二十四首，但都显示出特别鲜明的色泽，为庐山增添了难以磨灭的光彩。

“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
九江秀色可揽结，吾将此地巢云松。”

这首七绝，被后人视为歌咏庐山五老峰诗作之冠。也正因为这里景色奇胜，李白便在五老峰旁的屏风叠，“巢云松”，建书堂。

在李白的笔下，裂云而来，破壁而下的庐山瀑布，又是怎样的壮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这首七绝把人们对非人化的自然美和经过人美化的自然美的现实体验，上升到通过赏景者的想象、重新构筑的“第三态自然”美的崭新阶段。千百年后的今天，不仅中国把这首诗选进教科书，就连日本、韩国也把这首诗编入教材。

被贬为江州司马、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白居易，在庐山他寻觅到了“归去”的“春天”：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这首诗至今已有一千余年，但人们还是在它的吸引下，暮春时节一步一石阶，登上庐山，来到当年白居易歌咏桃花之地——花径，寻觅欣赏那艳丽的桃花。

白居易对庐山无限眷恋。他在庐山香炉峰结草堂，春去锦绣谷看花，夏至石门涧观云，秋赴虎溪赏月，冬上香炉峰咏雪。当他迁官四川忠州，仍眷恋庐山，写下了“山色有无中，江声莫惆怅，三年官满却归来”的诗句。

吟出千古名句“一寸光阴一寸金”的王贞白，便是在庐山白鹿洞发奋苦读时，领悟出时间对生命的珍贵，灵气与名句同生：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登临庐山后，他在《游庐山》一诗中这样写道：

“五老闲游依舫舫，碧梯云径好程途。
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这首诗突破了个人的悲喜，“荣辱此间无”。表现了思想境界超出一一般“迁客骚人”的地方。

宋代大名鼎鼎的诗人苏轼，在元丰七年四月初上庐山游览，使他惊异万分，竟不想作诗。是庐山的秀美难以状写描绘，还是词穷句缺难以成诗？一日，山中僧俗见苏轼，高呼：“苏子瞻来矣。”他不觉写五绝一首：

“芒鞋青竹杖，日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

苏轼“自晒前言之谬，又复作两绝”。后游开先寺，主僧求诗，苏轼又写七绝一首。见“漱玉亭、三峡桥”，又作《庐山二胜》两首；并为漱玉亭题写了匾额，至今仍挂在漱玉亭上。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作《题西林（寺）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首诗是他遍游庐山南北后对庐山全貌概括而富哲理的题咏。

以变法著称于世的王安石，在庐山也体现其精神焕发的情致，在《锦绣谷》一诗中写道：

“还家一笑即芳晨，好与名山作主人。

邂逅五湖乘兴往，相邀锦绣谷中春。”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对庐山的雄伟气势、壮美景色，心醉神迷留恋难舍，诗兴大发。他在《庐山诗》中写道：

“庐山竹影几千秋，云锁高峰水自流。
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眼观西北三千界，势压东南百万州。好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分再来游。”

著色庐山
花如锦绣
乾坤气象
仙人洞
无限风光
在险峰

毛主席诗咏庐山仙人洞

至清代，王士禛、毛德琦、沈德潜、袁枚、姚鼐、魏源、陈宝箴、康有为、陈三立等许多名家，无不对庐山寄予深切的情意。民国年间，许世英、于右任、李烈钧、胡适、徐志摩、蒋光慈以及后来的郁达夫、陈寅恪等，也都在庐山留下了著名的诗篇。近代方志学家吴宗慈的《庐山志》，便辑录了自晋至清末民初一千六百多年间千余诗人三千七百余首诗词。

解放后，领导、名人、学者来山者更众，歌咏更富，诗词总数当在千余首以上。近年，仅江州诗词学社出版的《匡庐诗词》，便有三册之多。

毛泽东曾三次登上庐山，写诗两首。1959年党的生日那天，他那如椽大笔，写下了《七律·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笼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

这首七律，一开始就用雄奇的巨笔，描绘出庐山的宏伟和壮丽：在宽阔平坦的九江地带，庐山拔地而起，迎风耸立，白云在奇峰上缓缓飘移，江湖在山麓静静流淌，满山的树木苍翠欲滴。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乌托邦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代之而起的，是朝气蓬

勃、生机无限的社会主义！

戎马一生的朱德，在国务倥偬之余，来到庐山植物园，挥毫盛赞庐山云雾茶：

“庐山云雾茶，味浓性泼辣。若得长年饮，延年益寿法。”

这首五绝，是在赞庐山云雾茶，但又何尝不是对和平恬静生活的渴望！

此外，谢觉哉、董必武、林伯渠、郭沫若、叶圣陶、邵式平等，在庐山均有题咏。卓识远见者，在庐山的美景面前，衷心祈祷：“风雷再莫扰平林。”

夏征农在《庐山初识》中写道：

“庐山难有几日晴，雾散云开看得真。万树横空堪蔽日，群峰竞秀任翻新。含鄱带水雄姿在，幽谷清泉韵味深。景丽物华人共赏，风雷再莫扰平林。”

洋溢生命之醇芳、散发美学之幽光的庐山诗歌，是组成庐山文化极为重要的部分，也是人类珍贵的文化遗产。庐山这些光彩千古不灭的诗歌，不仅沟通了古今思想，也深化了庐山的自然美，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树起了一座令人向往的理想的高峰。

在庐山，人们智慧的鲜花四季盛开，庐山是座千古名山，庐山诗歌和庐山一样千古不灭！

千古庐山千古诗！

（作者系庐山植物园副研究员）

佛光道影溢匡庐

——庐山宗教巡礼

●张国宏

驻足庐山简寂观，清代戏剧家李渔曾感慨万端，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语佛说尽，谁识得三千妙谛，出我先师。”联语不仅勾勒出了庐山道教衰败的图景，也展示出了庐山佛教繁盛的画面。

据说，在战国周威烈王时期，有一位名叫匡俗的人因好道术，携兄弟六人寓隐庐山虎溪，结庐修炼。消息传入朝廷，周王屡请他出山相助，都遭回拒。不久得道成仙，人去庐存，由此而留下了“神仙之庐”的美名。公元前210年和公元前106年，希冀长生不老的秦始皇和汉武帝巡视江南，浮江而下，兴致勃勃地登上上霄峰和紫霄峰，虔诚地祭祀庐山，勒石存念。汉武帝还特意在匡俗得道之所下诏立祠，赐其号“大明公”，庐山作为“神仙之庐”的声名益发显赫起来。自此，神仙家们常常借此名山为神仙道术呐喊助威，推波助澜，打开了庐山宗教的法门。

晋太元六年（381年），随师南下的慧远途经浔阳（今江西九江），见庐山闲旷，足以息心，便停留下来，筑龙泉精舍以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学侣益众，精舍地狭难容，先期来山的同门师兄慧永便向江州刺史桓伊请求，为慧远在西林寺之东构建起了东林寺。慧远在寺中，三十六年如一日，致力于弘扬佛法。创造性地提出了神不灭论和三报论，完善了因果报应学说，并邀集123名贞信之士聚集般若台前，发愿文，建斋立誓，共期往生净土。很快便被一般群众所接受和认可，净土学说得到广泛的流传。在慧远手上，确立了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也确立了庐山作为南方佛学中心的地位，并将东林寺推上了宗教的神

坛，令海内外僧俗“东向稽首”，顶礼膜拜。

慧远以严谨道风和渊博学识受到了广大学士隐者的普遍欢迎。他的同门师兄慧永、弟弟慧持、姑母道仪、隐士周续之、雷次宗、刘遗民等都追随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和以他为核心的庞大僧士团，共同致力于往生净土的宣扬。而他的作为也博得了朝廷权贵的敬慕。相继担任过江州刺史的桓伊、王凝之、桓伟、何无忌等都与慧远深交，司徒王谧，护军处默亦曾“遥致师敬”，一度掌管朝政的桓玄甚至在“沙汰”佛寺僧尼的情况下，独对东林寺特别关照，下令说明“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使庐山这一南方的佛教圣地，得以保护和发展。

几乎同时，道士陆修静爱匡阜之胜，在金鸡峰下构筑起了一座名曰太虚观的道观。他以此观为大本营，研经传道授徒长达七年之久。“大敞法门，深弘典奥”，创立了大行于世的南天师道，使之成为与寇谦之创立的北天师道相抗衡的重要道派。隋唐时期，统治者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极力高扬佛教和道教，使庐山佛道势力日炽一日，进入鼎盛时期。隋开皇九年（589年），中国历史上另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的创立者智顗来到庐山，憩泊东林寺，钻研佛法，留下了天台宗的止观并重，定慧双修的最高修行原则。他的弟子智谔、大志等先后住持大林寺，宣扬天台宗，使庐山走上了南北佛学大融合、大发展的道路。

步智顗后尘，禅宗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在唐武德年间（618～626年）相携登临庐山传法。八祖道一承其衣钵，隐居庐山凌霄洞和马祖洞，构筑凌霄院和马祖寺，居持禅定长达12年。他把凌霄院整饬为一座规模臻备，影



东林寺普贤佛像

响极大的名刹，时有“僧舍都丽，无过于凌霄院”的赞誉。道一离开庐山后，其弟子智常、法藏、神凑继续在山倡导“顿悟成佛”说，保证了其创立的“洪州宗”和禅宗势力在庐山和江南的延续性和影响力。从那时起，禅宗理论和简易法门牢固地扎根于庐山寺庙，根植于僧俗心中。

佛教宗派的崛起极大地刺激了道教扩张势力的欲望，唐李氏王朝视道教为正统的政策，为道教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开元十九年（731年），唐玄宗诏令江州刺史独孤正择地兴建庐山使者庙。在朝散大夫杨楚玉、浔阳县令魏昌等协助下，很快便盖起了一座殿宇轩昂的使者庙。唐玄宗赐额敕画，抽调高道，设斋问醮，大供道观，并将其拔高到与五岳真君庙并列的尊崇地位。同时，又诏令天下学士杜撰庙中碑文，“纪贞石于名山，壮鸿规于帝力”，使庐山使者庙一跃成为中国道教的第八洞天。

与庐山使者庙相颉颃，东林寺受到“倍臣檀施，扩供兴作”，继续保持着昔日的影响力。在江州刺史韦丹、江州司马白居易等大力扶持下，东林寺鼎盛一时。寺内殿厢塔室、亭台楼阁多达310余间，藏书一万多卷，僧侣常数百人。

天宝七年（748年）冬天，鉴真在第五次东渡日本失败后，折返扬州途中，特地到慕名已久的东林寺作短暂停留，观藏经、论佛理、览风景，对东林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激发了六渡日本的豪情。所以，五年后他第六次东渡

日本时，将东林寺智恩带在身边，随同前往，以惊人毅力完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很有意义和很有影响的壮举——东渡日本弘传佛教。鉴真到日本后，弘法讲学，把东林教义传到日本，使东林之法在日本扎根张扬，发展成为现代日本佛教中很有影响的东林教。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极有意义的一幕。

东林寺和庐山使者庙的盛况，带动了庐山宗教的发展。“庐阜招提三百所”和“四方学者，差肩继踵”，成为释道两教昌盛的真实写照。投迹寺观、交游僧道的文人学士也明显增加。李白、白居易、颜真卿、刘禹锡、李渤、柳宗元、张九龄等纷纷来山学禅求仙，谈禅论道，创作出了丰富而极具想象力的禅诗道文，推动和扩张了庐山宗教影响。

这一局面在两宋时期继续保持。佛教势力的张扬以禅宗为代表，其五家七宗在庐山均有传人，尤以临济宗、沩仰宗、法眼宗、云门宗突出。临济宗门人集中于东林、开先、归宗诸刹，沩仰宗门人居于宝严寺、化城寺、栖贤寺为法眼宗掌握，圆通寺则为云门宗控制。并涌现出了白云守端、道颜、行机等一大批禅学精深的名僧。他们各持一说，遥相呼应，将禅宗绵延相续下来。其中，行瑛重修开先寺，把它恢复成拥屋百间，穷壮极丽的一时名刹。东林寺在常总住持时，殿阁繁复，多达千楹。其它寺院也应时而兴，及时恢复。一时间新旧寺院，争奇斗胜，环列山中，蔚然大观。

与寺院急剧增加相适应，来山的佛徒也与日俱增。福海院一度栖居僧徒1200人，开先僧有千人之众，东林寺常总门下亦常聚集数百人，慧诚住持归宗寺十四载，聚徒五百，真净克文在归宗寺住持时，有“山穷食寡，学者益友”之说。而这时许多文人学士，如范仲淹、秦观、苏轼、欧阳修、朱熹、黄庭坚、米芾、李纲、王安石等纷至庐山，入寺院、交僧徒。其间，黄庭坚书写《七佛偈》，推重真净克文；欧阳修与居讷夜话圆通寺，题诗相赠；苏轼、苏辙与栖贤寺智迁和尚相交，撰记书碑，积极宣扬和支持庐山佛教。

几乎同时，庐山道教也非常兴盛。道教学者陈抟、陈景元、白玉蟾、刘虚谷等都在庐山活动。其中，陈抟游历白鹤、简霞诸观，受《易经心法》于许坚；白玉蟾遍历山中诸胜，留有



唐护法力士

大量诗文；陈景元在庐山亲校道书，至死不倦，著述多达千卷；刘虚谷写下阐释内丹修炼之术的《内丹篇》一书，将庐山道教理论研究推进了一步。

在他们大力鼓吹下，庐山道教显示出了很大的吸引力，引起了朝廷官府的高度重视。宋太宗在太平兴国中（976～984年），诏令庙以纪元易名为太平兴国观；熙宁中（1068～1077年），宋禅宗又命于观中置祠官。及宣和六年（1124年），徽宗又升观为宫，正式名为“太平宫”，一再抬高太平宫的地位，并将之大力拓置，“糜费不可胜纪”，把此宫修饰成为唐宋之际庐山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道观。

当整个封建社会步入衰落期——明清时期的时候，庐山佛道依然保持完整，飘逸着佛光道影，曾任嘉定知州的明人张率来游庐山时，目睹漫山佛寺，感慨赋诗：“庐山到处是浮图，若问凡家半个无。只因渊明曾好酒，至今有鸟号提壶。”

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帝业后，特遣使者到庐山寻访当年“告太平”的神僧周颠，在遍寻无果的情况下，他下令在庐山顶端构建起御碑亭，并亲撰碑文传记。为修建御碑亭，朱元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从庐山西北麓开辟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明代上山通道——九十九盘路。这条路起自东林寺，沿路建有锦涧、半云、甘露、一息、披霞五亭。供游人休息观景。朱元璋在庐山还修建了一座访仙亭，亦名周颠亭，也是专门为纪念周颠而建的。因天池寺距此亭较近，朱元璋又崇饰天池寺，以寓祀周颠、觉显、天眼尊者和徐道人“四仙”，并敕封“天地护国寺”之名。后明成祖朱棣再敕“天池万寿寺”额，益加修葺，明宣宗又敕“天池妙吉

禅寺”，命江西都指挥司和布政使司“以人力修天池寺”，这就是历史上的“三敕天池寺”。

爱屋及乌。朱元璋把对庐山佛教的挚情扩及庐山。他下令敕封庐山为“庐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与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并列，并且规定南康、九江两府每年春秋“合祀天池寺”，这是庐山和庐山佛教第一次受到封建朝廷的如此尊崇。二百年后，明神宗又建庐岳祠于山南万寿寺左侧，作为南康府春秋二祀的固定场所，不再二府合祀了。但每逢春秋两季，德化县知县亲到天池寺躬祭却始终未断，相沿不废。而每年岁首，庐山各寺庙僧人也都要前往天池寺敬香朝拜，以为定例。

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清末民初，庐山佛道势力，江河日下，同时西方宗教势力的渗入，打破了长期以来“释道同尊”的局面。英国传教士李德立租借牯岭，俄国东正教牧师尼娑、美国传教士海格思、法国传教士樊体爱接踵而至，大肆活动，其中尤以基督教为盛。当时可查的14座教堂中属于基督教的就多达12座。每至夏日，该教传教士更是云集，常达数百人。由此，庐山成为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活动中心。天主教9个教派和耶稣教16个教派的活动，构成了近代庐山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庐山宗教经过千年沧桑变幻，绵延相续，演化出了一山兼具五教的罕见现象，在中国诸多的名山中独树一帜，值得我们研究探讨。

（作者系庐山文物管理所干部）



明经亭

道教宗师

陆修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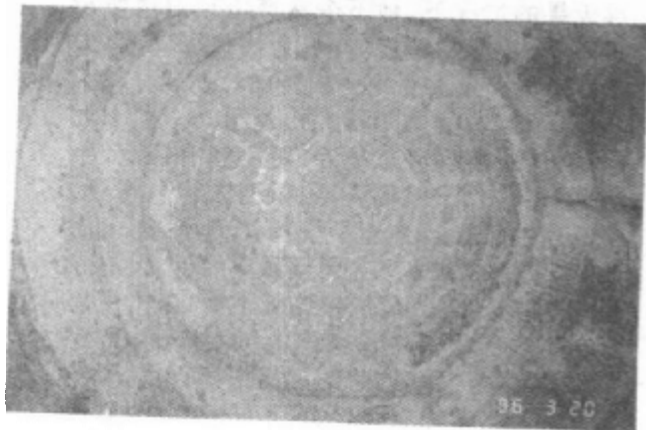
● 凤衔

道教南天师道的创始人陆修静(406—477年),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是三国时期吴国丞相陆凯的后代,父亲陆琳为高道处士。陆修静自幼博览群书,“笃好文籍,旁究象纬,通辟谷之术”。年轻时,遗弃妻子,研习道教经籍符录,曾先后往云梦山、衡山、九嶷山、罗浮山、巫山、峨嵋山等名山胜地访仙求道。元嘉(424—453年)末年,陆修静到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受到南朝宋文帝的召见和尊重。文帝的母亲王太后,崇信黄老之术,向陆修静执门徒之礼。大明五年(461年),陆修静到达庐山。他爱慕庐山胜景,在庐山东南麓的金鸡峰下建筑道观,取名太虚观。观的左侧与后侧有两处瀑布高悬,观的周围遍植松竹,环境极为幽静,是传道修行的理想场所。陆修静在庐山修道,前后十七年。泰始三年(467年),宋明帝诏陆修静进京,在建康北郊天印山建崇虚观请他居住,对他极为礼遇,询问他道家经典情况,陆修静回答说:“道家经书,并药方、符图等,总一千二百二十八卷,其一千零九十卷已刊行于世,一百三十八卷犹在天宫”。陆修静所说的道教书目,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道教书目概数,其卷数也可

与当时翻译成汉文的佛书一千四百九十三卷相匹敌,其余的“犹在天宫”,那是道士们故弄玄虚的话。庐山太虚观道藏阁,拥有当时最完备的道家藏书,是道教最大的经库。据说用“龙篋贮之”,相当讲究。后来道藏阁被火烧焚,十分可惜。

建康为六朝都城,崇虚观占地利之便,陆修静在这里广集古今道家、道教经书,加以分类、甄别、整理,列为洞真、洞玄、洞神三部,合称《三洞经书》。三洞分类法,是当时较为合理的分类方法,为此后《道藏》分类所仿效,这是陆修静的一个创举。从陆修静编《三洞经书》开始,道教经书第一次得到系统整理,对道家典籍的保存和传播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整理汇编道经外,陆修静自己的论著达一百余篇。其主要著作有:《道德经杂说》、《灵宝经目序》、《灵宝步虚词》、《太上洞元灵宝授度仪》、《涂炭斋仪》、《三元斋仪》、《必然论》、《荣隐论》、《遂通论》、《归根论》、《自然因缘论》及《陆先生道门科略》等。在这些著作中,他大力倡导推崇道教斋戒科仪的重要,把它看成是“道化宣流,家国太平”的有力措施。他认为,“身为杀盗淫动,故役之以礼拜;口有恶言,绮妄两舌,故课之以诵经;心有贪欲真患之念,故使之以思神。用此三法,洗心净行,心行精至,斋之义也”。用“礼拜”、“诵经”、“思神”三种方法,来消除邪念恶行,认为这是斋戒科仪的意义所在。这较之早期天师道的斋戒科仪,更为规范和精致,对心灵净化的目的更明确,对道教的教规教仪是一个重大的改造和发展。



天池塔顶内的道教八卦图